

建国以来山越研究述评

程凌雷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山越”一词见于文献记载,最早在东汉末年,《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169年)“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三国志》中有大量关于山越的记载,中经隋唐,至宋代,尚有零星记载。三国时期是山越活动最频繁的时期,故学界讨论也多以这一时期的山越为主要对象。关于山越,国内学界尚有颇多争论。下面将国内学者有关山越的研究状况作一述评,以期能推动此一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山越的组成

关于山越的组成成分以及它是否成为一个民族,学界有多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山越是古越人的后裔,因而是少数民族;第二种观点认为山越是由已汉化的古越人后裔和入山的汉人组成的南方土著,不是一个民族群体;第三种观点认为山越是由山居的古越人后裔和入山的汉人组成的少数民族;这三种观点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另有学者认为应将山越看作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

杨国宜《东吴平定皖南山越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安徽史学》1960年2期)认为,皖南山越是由居住于山中的越人和入山的汉人组成,“三国时期的山越,虽然在称谓上还带有一个越字,但不能简单地看作越人,应当认为是居住于山区的南方土著”。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与杨国宜观点一致,认为山越由汉化的居山的越人和避役入山的人民组成,“山越虽然从称谓上表示其为一个种族,实际上除了福建、江西一些偏僻之区外,只能认作居于山地的南方土著”,“山越之‘越’在此时也只是指原先越人的分布地区而已”。

陈可畏《东越、山越的来源和发展》(《历史论丛》第一辑,1964年)认为:“山越并不完全是东越的后裔,其中有一部分是汉人。”张崇根《三国孙吴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历史教学》1982年10期)也持同样的观点,“山越是东汉末年由古代越人的遗裔与部分汉族人,在我国东南部山区经过长期的共同劳动和斗争,逐渐融合而形成的少数民族”。

叶国庆、辛士成《关于山越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百越民族史论集》,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认为:“山越是秦汉间越和闽越的后裔。”这一观点来自于胡三省《通鉴》汉纪,灵帝建宁二年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山越,越民依阻山险而居者。”陈国强等著《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蒋炳钊、吴绵吉、辛士成著《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两书中赞同并补充了这种看法,认为“山越是百

越民族的后裔”。关于《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中“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和《陆逊传》“吴会、丹阳,多有伏匿”两句所指,学界亦有争论。陈可畏认为“在这些逃亡者中,大多数无疑是汉人,这些入山的汉人,后来也就成了山越的一个组成部分”。陈国强等则认为,三国时代,吴郡、丹阳郡、会稽郡是山越较为集中的地方,“多有伏匿”指的是山居的越人,“逋亡宿恶,咸共逃窜”指东汉末年原居住在平地的那些越人,因不堪受汉族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大批地逃到山区去,找族人聚居。山越在语言、居住地、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古越人基本一致,山越是一个由平地居住的越人和原山区的越人结合而成的少数民族。

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1984年第10期)对唐长孺“山民、山贼、山寇与山越是互称”的观点从概念上进行了辨驳。他对比《三国志》的有关记载认为,山越非山民、山贼、山寇。山民、山贼、山寇所指范围远比山越广泛,包括生活在山区的汉人或豪强割据集团、山越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施文指出:一、山越是越族后裔,汉武帝统一东越以后,其一部分迁至江淮地区生活,和汉族融合,另一部分则进入山区,形成山越。山越仍然具备古越族的特征,是作为一个民族存在,活动于汉末三国时期。二、山民是“入山之民”的通称,包括山越、入山汉人和其他山区少数民族,而山越则是一个特定的民族称谓。何光岳《山越的分布与消融》(《吉安师专学报》1994年第5期)一文亦持这种观点。因为《三国志·吴书》中山越与山民、山贼、宗部是混称的,这种看法在概念上将山越与山民、山寇、山贼、宗部截然分开,但是在史书中却很难界定。

李天雪《山越辨析》(《社科纵横》2003年第6期)有新的看法,认为“三国时期史书中发现的山越由于民族融合和史书编撰等原因,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民族概念,只是强调其地域特征,山越是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出现在三国时期的文献中,并以一个多民族的联合体形式出现在三国的政治舞台”。

关于史书记载的山越是一个地域性名称还是一个民族性名称,由于史书关于山越、山民、山贼、山寇记载的混乱,学界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山越与古越人有关。首先,东南地区本来就是古代百越民族的聚居地。其次,秦汉时代越族自发和被强制迁徙以及汉族向东南地区的移民,使得汉人与越人出现了交错杂居的情形。汉末三国时期出现的山越这一群体,应该与历史上民族杂居的情况相符。山越中肯定有古代越人的后裔,同时也会有各种原因入山的汉人。至于山越这一时期是否是一独立的少数民族,则应该根据史料记载的山越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作全面综合的分析及科学的推理。

二、山越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发展阶段

《三国志》中记载山越的社会组织为“宗”、“宗部”、“宗伍”,其民人则被称为“宗人”、“宗民”,其首领被称为“宗帅”、“渠帅”、“大帅”。因为学者对山越的成分、来源、性质看法不同,相应地对其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想法也不同。

杨国宜《东吴平定皖南山越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一文认为“宗部与山越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简直是互称”,“只要研究一下宗部的社会性质,就可以明了山越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倾向”;“宗是指宗族,宗部是指结聚宗族而成的部伍。宗族是战国以来逐渐崩溃的以血缘关

系和地域关系构成的氏族公社的遗留,是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上的一种落后集团”;“宗族与封建政权和农民之间都存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宗族中的地主集团组织宗族武装即宗部,一方面抗拒政府,拒绝服役,一方面镇压农民起义”;“山贼——山越——宗部的性质为落后的宗族地主武装”。

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与杨文观点一致,认为山越同平地居的汉人没有什么差别,其宗部组织同东汉末年南北普遍存在的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豪强大族的武装组织是一样的。宗部之宗是指宗族而言,宗部、宗伍是以宗族为核心的武装组织,宗人、宗民是指宗族或参加这种宗族武装组织的人民,宗帅是大族豪强。山越宗部不是种族性的组织,山越依托于豪强大族,受大族控制,在险阻之地组成武装集团。在《三国志·吴书》中,山民、山贼、山寇和宗部简直是互称。宗人、宗民与山民的区别只是前者是就其组织而言,后者是就其山居而言。

杨、唐二人虽都认为山越不是一个民族,但对其宗部的性质却持不同观点。

刘汉东《东吴山越社会阶段初探》(《郑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则继承和发展了唐长孺的观点,并对东吴山越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探索。认为山越实际上是居住于山区的人民,成分为同化在汉人中的古越人和因故避入山区的汉人。山民被当时统治者称山越,正如又称山贼、山寇、宗贼一样,乃是带有蔑视之意的称呼。从山越阶级分化较深、阶级结构发育成熟、主要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抗拒赋役和料兵、聚居方式和语言、习俗、地名、人名等各个角度分析,山越人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汉人或东吴社会所处阶段没有什么不同,处于同一水平上。山越以宗部宗伍的形式存在,聚集宗族、宗党或乡人共居,形成大小规模不一的乡里共同体组织。宗帅是山越的上层阶级,掌握山越人的各种权利;宗民是山越的下层阶级,随时受制于宗帅。山越以宗族结合建立的宗部又称为屯,这与北方宗族、乡里武装集团的坞堡壁垒性质完全一样。

张崇根《三国孙吴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认为山越由于山居的隔绝、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而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组织,他们只是聚族而居,以部落、宗族或氏族为一个独立单位,互不统属,所以史书上称为“宗”。

叶国庆、辛士成《关于山越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也认为山越是越人的后裔、少数民族,并且对其宗部、宗伍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山越的“宗”应是取自汉族“宗族”的形式,而其实质则是氏族或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组织;山越人民被称为“宗民”,其实质则是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山越的首领“宗帅”实质则是氏族或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贵族或酋长。平地居住的越人已经汉化,而山居的山越的社会组织,尚带有很多原始社会残余。

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对唐长孺宗部与山越是互称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山越和宗部有本质区别。第一,山越是一个少数民族,宗部则是汉族豪强地主的武装割据集团,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第二,山越和宗部虽然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但前者是由于生产力低下决定的,这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也常见,而宗部则是东汉豪强地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在宗法思想帷幕掩盖下的坞堡组织,豪强大族只是利用宗族血缘的躯壳,以保证自己对农民的控制和剥削。第三,山越和宗部虽然都与孙吴有矛盾,都反抗孙吴,有时也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但其性质截然不同,山越的叛乱是反抗孙吴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正义斗争;宗部的叛乱却是地

方割据势力反对孙吴统一南方的斗争,无进步可言。

山越的成分、社会组织及其发展阶段的研究是此一学术问题推进的关键,这关系着山越研究的其他方面。《三国志·吴书》中山越、山民、山寇、宗部是混用的,我们很难对它们做出严格的界定。就史书记载来看,山越是汉末三国时期居住山区的一个群体,但史书中关于其社会生活情况的记载很少。从汉末山越庞大的数量和从事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来看,山越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可能依然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者说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从《三国志》中有关山越宗帅与汉末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关系的记载来看,山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都不应该与平地的汉人有太多不同。学界的分歧正在于对山越的成分、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笔者认为,对汉末山越的研究,除了根据有限的史料外,还要结合越人的历史,应考虑到秦汉300年来汉越杂居对越人的影响,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三、关于山越的分布地区及特点

关于山越的分布地区及特点,学界的意见有两种。一种以陈可畏为代表,认为山越仅限于扬州,吴国广州、荆州南境零陵、桂阳等郡不是山越。张崇根《三国孙吴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何光岳《山越的分布与消融》同样认为山越分布于今闽浙赣皖苏等省的交界山区丛林中,分布的中心则在今皖南山区。另一种观点以叶国庆、辛士成、陈国强等为代表,认为按《三国志》的记载,汉末三国时期,在吴属的丹阳郡、会稽郡、新都郡、建安郡、吴兴郡、东阳郡、豫章郡、鄱阳郡、庐陵郡、长沙郡、零陵郡、苍梧郡及魏属的庐江郡都有山越居住着,即今天的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山区。这也与先秦时期百越的分布地域大体一致。他们探究山越分布特点,认为山越与汉族是大杂居小聚居。从整个山越分布的区域来看,山越与汉人是杂居在一起的,呈现大分散、大杂居的局面;从局部地区看,山越又是聚居在一起的,聚居的区域是各个郡县的山区。他们进一步考察造成山越这种分布的历史原因,即秦汉时期百越族自发或被强制的迁徙及汉人的南迁,形成了两者之间杂居的情形,不愿受秦汉政府管辖的越人则逃亡山林形成山越。

四、山越与孙吴的关系

学者对山越成分、性质、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使他们在讨论山越与孙吴的关系,以及评价孙吴与山越之间战争的性质、孙吴对山越的政策性质时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山越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学者多从民族的观点和角度进行讨论,认为山越只是山区的人民的学者则多从政治的角度立论。但不管山越是不是一个少数民族,山越对孙吴的政治、经济、外交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学者们都肯定的地方。探讨山越与孙吴关系的文章比较多,是学者讨论的重点。

从山越是居住南方的土著而不是一个民族实体这一立场出发进行讨论的有:

杨国宜《东吴平定皖南山越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探讨了孙吴平定皖南山越的原因、经过、吴对山越的处置及其作用。认为山越宗族组织是孙氏父子的统一事业的阻碍,东吴平定山

越的战争,既不是镇压少数民族,更不是镇压农民起义,而是与氏族公社残余的宗帅争夺劳动人口,巩固封建政权的必然与必要的措施。通过屯田制和世袭领兵制,封建制度更向前发展了,对于皖南山区的开发,江南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具有进步意义。

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认为,山越人民为了逃避政府的赋役而依附于山中豪强大族,并受其控制,宗帅则组织山民成立宗部这种武装组织,以抗拒政府的发调,孙吴屡次征伐山越就是和各宗帅争夺劳动力,孙吴的建国乃是以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对于另外若干个宗族集团即宗部的胜利,并以此建立了获得统治地位的宗族间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山越与孙吴之间斗争的性质既是孙吴政府对地方武装势力的镇压,也是以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与其他宗族争夺劳动力的控制权。

黄佩芳《孙吴与山越的关系初探》(《丽水师专学报》1986年2期)认为山越是江南山区的土著,孙吴与山越的关系应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探讨。195年孙策渡江到211年“权徙至秣陵”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为孙吴势力从江东兴起并统一和巩固的时期,孙吴对山越战争的目的是开拓疆土、稳定王基、建筑吴郡、会稽通往荆州的跳板,争民处于次要位置;战争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孙吴与其他割据势力的混战,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这一时期对山越中的下层采取“安抚”政策,对上层采取镇压和怀柔的政策。213年开始江东六郡完全控制在孙氏手中,其对山越的政策及目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开发兵财之源成为目的;实行“强者为兵,弱者补户”的政策;战争性质则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认为山越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学者,认为孙吴与山越是一种民族压迫与民族反抗的关系,并对山越反抗的原因、孙吴对山越的政策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将三国时期魏、蜀、吴的民族政策进行比较,进而对其各自的民族政策给出评价。

陈国强等著《百越民族史》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认为汉末三国时期山越反抗的原因是东汉末年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乱、经济的崩溃和孙吴的高压掠夺政策。孙吴镇压山越是为了巩固统治,同时也是为了扩大地盘、扩充兵员、掠夺人口以从事屯田和提供赋役。孙吴对山越的高压掠夺政策表现为对山越武力征讨、强制山越人当兵和成为政府控制下的编户民。孙吴的这种镇压和杀害山越人民的民族政策不利于山越的发展,但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江南地区的开发。

一些学者对三国时期魏、蜀、吴的民族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朱绍侯《三国民族政策优劣论》(《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3期)对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述评,认为孙吴把山越当成掠夺劳动力和兵源的对象,采取杀掠的野蛮手段,是两败俱伤的反动政策,民族政策最失败。张大可《论三国时期的民族政策》(载《三国史研究》,华文出版社,2003年)对朱文有所发展,认为从阶级观点来看,孙吴对山越的民族政策是高压征服、强取掠夺,民族压迫最重,民族政策最劣,但从历史主义观点来看,孙吴的民族政策最有利于民族融合,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王进科、吕永《镇压还是安抚——也谈孙权对山越的政策》(《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1期)对研究者们大多将孙权对山越的“镇抚”政策理解成民族高压政策进行商榷,认为山越对孙吴是主动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孙权对山越施以安抚为主、辅以武功的民族政策,先以守而安之为主,对降附的山民,强者补兵,羸者补户,政权强大后,对山越由守转攻。孙权的

镇抚政策是安抚政策而不是民族高压,通过安抚,孙吴基本解决了山越问题并获得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是很成功的民族政策。

还有学者对山越反抗对孙吴立国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争鸣。

吕锡生《山越在孙吴立国中的作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3期)探讨山越在孙吴立国中的作用,认为山越与豪强大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常常被豪强大族招诱为自己的附从,山越对孙吴的态度是根据所依附的大族的政治态度而定,既有拥孙的也有反孙的,但山越并没有影响孙氏在江东的奠基、御敌和称帝,山越并没有成为孙氏的心腹大患,孙吴进剿山越目的是掠夺人口、避免两面交敌。

缪元朗《也谈东吴与孙策孙权时期的山越——与吕锡生同志商榷》(《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4期)对吕说进行了商榷,认为山越的存在牵制了孙氏的兵力,影响了孙氏争霸江东、开拓疆土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左右了孙吴的外交政策,确属孙氏的心腹大患。

日本学者关尾史郎《曹魏政权与山越》(《文史哲》1993年3期)探讨了曹魏政权对作为孙吴境内反吴势力的山越的怀柔利用政策及其影响。认为居于孙吴中间地带的山越少数民族成为曹魏拉拢利用的对象,而山越也作为曹魏的内应频频反抗孙吴,这导致了山越民族被孙吴征讨成为俘虏的命运。

五、关于山越民族史及区域性的研究

认为山越是少数民族的学者对山越的历史、山越与汉族的融合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

施光明《论山越和汉民族的融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1期)探讨了山越的历史渊源及三国时期山越与汉族的融合途径与方式,指出了暴力斗争在民族融合进程中起到的客观作用。安般《山越盛衰浅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4期)对山越的由来、分布、盛衰及其原因作了分析,认为山越“绝不仅仅是某一支越人的后裔,而是居住在山地的各支越人的总称”,山越与汉族融合的原因有外因和内因,外因即汉人势力的扩张,内因即越文明与汉文明的较大差距,山越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山越是古越人后裔,学者对山越来源于秦汉时代百越的哪一支展开了探索。江应樑《说濮》(《思想战线》1980年1期)认为山越是江汉地区古濮人的后裔。吴永章《越非濮后裔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82年2期)则进行了反驳,认为山越是春秋末年主要聚居在浙江的於越的后裔。

此外,区域性的山越个案研究也比较多,内容多为探讨江西、安徽两省三国时期山越的分布、与孙吴的关系或孙吴对山越的政策及影响,但重复研究很多。关于江西山越的论文有:袁刚《孙吴鄱阳郡宗民暴动及其性质》(《文史哲》1987年4期)探讨了鄱阳郡山越的民族和阶级属性,认为三国时期的山越和秦汉时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越人已大不相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汉化,很难再把他们看作少数民族;山越宗帅是地方豪强大族,江南宗部与北方坞壁一样,是自卫的武装组织;鄱阳郡的宗部暴乱,乃是地方豪强大族所倡,不一定是农民起义;孙吴镇压暴乱,不能说成是反动政策,更无从比较魏、蜀、吴民族政策的优劣。周兆望《孙吴时期江西境内的山越及其对经济开发的贡献》(《争鸣》1992年3期)探讨了江西山越分布和活动的特点,

估算了江西境内山越的人户,认为山越宗帅就是豪强大族,其所立坞壁、屯邸有军事防御和组织生产的双重职能,客观上对江西山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山越成为国家编户民以后,参加屯田、兴修水利,对江西的开发做了重大贡献。

关于安徽山越的文章有:杨国宜《东吴平定皖南山越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施光明《论皖南山越》(《安徽史学》1986年4期)对皖南山越的来源、反抗孙吴的斗争、与汉民族的融合进行了探讨,认为皖南山越不是由秦汉时期迁徙到江淮间的东越人组成,而是秦汉时逃避迁徙而流亡的东越人的后裔,孙吴对山越的镇抚政策是一种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山越与汉人的相处、孙吴对山越的镇压客观上推动了民族的融合。翟屯建《徽州古史二题》(《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2期)利用地方志考察出徽州的山越成分主要是农民,不包括地主贵族,认为徽州山越的性质是以武力反抗地主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山寨集团,并非民族实体。

六、结语

回顾建国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山越的研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研究视角广泛、成果颇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对山越进行了探讨。既有对其成分、来源、性质、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阶段、分布、与孙吴的关系的整体研究,也有对其历史的考察,还有区域性的山越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第二,学术争鸣较多。学界对山越成分、来源、性质、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阶段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并进行了商榷,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第三,对中国古代民族理论研究和构建不足。多数论者在探讨山越是否成为一个民族时,缺乏对中国古代民族理论中关于少数民族判断的标准即华夷之辨、民族融合的程度等的研究,就山越论山越。第四,重复研究较多。很多学者往往跳过对山越族性的考察,依据前人研究的成果,或直接认定山越是少数民族,或直接认定其为非民族实体,在此基础上探讨山越的反抗斗争、与孙吴的关系、孙吴对山越的政策,罗列史实,观点重复且缺乏新意。

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开来。笔者认为未来山越研究的方向有三,一是将山越的研究与中国古代民族理论的研究相结合,由史实出发构建中国古代民族理论体系,由此考察山越族性问题。二是将史书记载的山越与其它立传的少数民族对比考察,《三国志》和《汉书》对山越并没有立传,因此将《三国志》与《汉书》中有关山越和其他立传的少数民族的记载进行比较,以判断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史家对山越的族性的认识。山越族性问题解决了,其他相关问题迎刃而解。三是对山越成分、来源、性质、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研究要以历史的、联系的观点放在长时段中考察,要考虑到越族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与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